

楊守敬 熊會貞 疏  
楊廷宏 楊世燦 楊未冬 補

# 水經注疏補

上編

中華書局

楊守敬 熊會貞 疏  
楊甦宏 楊世燦 楊未冬 補

# 水經注疏補

上編

中華書局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水經注疏補.上編 / 楊守敬,熊會貞疏;楊甦宏,楊世燦,楊未冬補. —北京:中華書局,2014.1

ISBN 978 - 7 - 101 - 09718 - 4

I. 水… II. ①楊…②熊…③楊…④楊…⑤楊…  
III. ①古水道 - 歷史地理 - 中國②《水經注》 - 研究 -  
IV. K928.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數據核字(2013)第 241026 號

---

書 名 水經注疏補(上編)

疏 者 楊守敬 熊會貞

補 者 楊甦宏 楊世燦 楊未冬

責任編輯 王 勛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張 66½ 插頁 2 字數 890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9718 - 4

定 價 280.00 元

---

# 序

楊甦宏、楊世燦、楊未冬的《水經注疏補》(上編)將由中華書局出版。該書循《水經注疏》體例,補中國西部、一級九大水系與黃河流域及其詳細支流,對《水經注疏》所記黃河水系大部分水道的源頭、流向和河渠、湖澤的形成、變遷,流域所經主要城邑興衰及治所沿革予以校勘,對所據引的古地理著作、摘選的史料、古詞語予以注釋,並注補了現代治水的大量科技成果,提出了《水經注》研究經濟發展方向的科學發展觀點。該書的出版是鄴學界的一件大事。

爲什麼是鄴學界的一件大事?因爲他們所“補”的是楊氏先人的《水經注疏》,所以有必要把《水經注疏》在《水經注》許多版本中的價值和地位作出說明。《水經注》或許算得上是我國著名古籍版本(包括刊本、拓印本、影印本、鈔本等)最多的文獻之一。胡適在其北京大學校長任上,爲了慶祝北大建立五十周年紀念,曾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十二月在北大舉行了一次《水經注》版本展覽,展出了此書的各種刊本、鈔本等共九類,達四十一種之多。按拙撰《水經注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版)卷首所列的參校諸本也達三十七種。胡適的四十一種,由於是分類陳列的,同類之中有的其實是不同的年代刊刻的同一版本。而拙書參校的是不同年代刊刻的不同版本,都是名家專校的,所以絕無相同的本子。我校注此本,在參校諸本中,當然有不少對一字一句具有重要價值的珍稀善本,但我的體會是,在我過目的諸本中注釋量最大的當然是《水經注疏》,而讓我獲益最多的或許也是此本。

另外還必須指出的是,鄴學從清朝以來已經成爲一門國際性的學問,歐洲漢學家和日本漢學家常常在他們的研究工作中用《水經注》爲參考文獻,亦有從事專門研究者。森鹿三教授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畢生曾三度出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這個日本最著名的漢學研究中心,是日本鄴學研究的帶頭人,撰寫過不少鄴學文章。特別是在1964—1970年的六年之中,他在研究所舉辦了

一個“《水經注疏》訂補研究班”，網羅了全國酈學家和他的所內研究生從事研究。每周由他親自主持一次會讀，以《水經注疏》為基礎，對《河水》、《汝水》、《泗水》、《沂水》、《洙水》、《沔水》、《淮水》、《江水》等篇，進行逐字逐句地評讀精研，討論分析。經過這樣深入細緻的數年集體鑽研，森鹿三開始了以《水經注疏》為基礎的酈注翻譯工作。翻譯的過程是非常認真慎重的。以《河水注》五卷為例，首先由森鹿三和其他譯者對原文進行集體琢磨和反復討論，然後由大阪大學的日原利國教授譯成日語古文，最後由藤善真澄和勝村哲也二教授譯成現代日語。《河水注》以外的其他卷篇，主要由另一位著名酈學家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公立大學教授退休後均稱該大學的“名譽教授”）日比野丈夫所譯。森鹿三本人還在譯文卷末寫了詳細的《水經注解釋》一文，介紹酈學這門宏大學問的淵源。最後終於在 1974 年出版了這部日譯節本《〈水經注〉抄》（《中國古典文學大系》之一，東京平凡社出版）。儘管這不是一部全譯本，內容只有《水經注》全書的四分之一，但已經可算是此書歷來第一部比較完整的外文譯本了。而且譯文信達，注釋詳盡，受到學術界的好評。我國科學史專家胡道靜先生曾在他的《談古籍普查和情報》（《歷史研究》1983 年第 4 期）一文中稱道這個譯本的完善。我也為這個譯本撰寫了《評森鹿三主譯〈水經注〉》（原載《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1 年第 4 期），收入於拙著《水經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1983 年我受聘在日本關西大學大學院（研究生院）作客座教授一學期，課程就是《水經注研究》，韓國籍博士生金秀雄君（當時中韓尚無外交關係），把此文翻譯成日語，在關西大學《史泉》第 57 期發表（1982 年 12 月），備受日本學術界的關注。所以我甫抵該校，就有幾位研究生與我討論這個日譯本的問題。《〈水經注〉抄》當然是一部日譯佳本，但是這種成果得自“《水經注疏》訂補研究班”，《水經注疏》在《水經注》的外文譯本中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

前面已經述及，《水經注》是我國古籍中版本最多的文獻之一。自從 1980 年以後，我頻頻出國講學，除日本外，足跡頗廣，遠及南美洲的巴西。而講學的內容也常有《水經注》的課題，涉及此書不少版本，但是我確實是重視並崇拜《水

經注疏》的，也因此而專題撰寫過《關於〈水經注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原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4輯，收入拙著《水經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文。後來又在出國講學事務十分繁忙的情況下，為段熙仲教授的校本作了復校。對於《水經注疏》這部功力甚大而版本却很不完整的鄺學巨構，我之所以能頗有見聞，實在要歸功於1983年關西大學的客座教授課程。客座教授與一般外國邀請的所謂“講學”不同。因為“講學”當然不是官員們美其名曰“考察”的公費旅遊。受邀講學者當然多是飽學之士，其中不少學者並用外語宣講。但講學的事，在一所大學中不過幾次，講幾個課題。然後去別所大學，也可以講同樣的課題，我在南北美洲的講學就是這樣。但客座教授則不同，事前邀聘時就商定承擔固定的課程，與此校的其他教師一樣是按上下課時間同時作業的。我在關西大學為文學院研究生講授“《水經注》研究”時，該校文學院的另一位森鹿三的高足藤善真澄教授，也正為本科生開設《水經·江水注》課程，我們成了同行，從此相識，而且成為莫逆。他立刻在外面書店購買了臺北中華書局出版的《楊、熊合撰〈水經注疏〉》全集共十八冊（含卷首汪辟疆序共五千餘頁）相贈。當時在國內根本無法獲得臺灣出的書刊，在日本出售這類專業性很強的臺灣版書刊也不多。這其實是當年李子魁口上招搖撞騙而汪辟疆竟信以為真的“謄清正本”。所以在大陸學術界，我是第一位獲得此本的學者。沒有此本，我也無法為段熙仲教授按北京本校勘而錯訛甚多的本子進行復校的。

藤善教授此後一直與我交往，後來我又幾度去日本，擔任過國立大阪大學和廣島大學的客座教授。但每次都見面暢叙，雖然他英語較遜，但因以後每次東渡都有我嫻熟日語的夫人隨同，所以暢談甚洽，直到2002年我年屆八旬，這年十二月，我仍受京都大學之邀，由夫人陪同前去，他仍然到我們寓處暢叙，而談論的主要還是《水經注》問題，我又當面舊事重提，感謝那年他贈我臺北本的重要價值，此書當年對我國的鄺學研究確實具有重要意義。

那年在關西大學為研究生講學，不僅獲得了當時大陸所無的臺北本《水經注疏》，而且還因此溝通了與香港鄺學家的關係。當時，香港尚未回歸，兩地的

學術交流很少。在酈學研究方面實在完全沒有互通聲氣。因為日本與香港在學術上的聯繫較多，香港著名酈學家吳天任先生就知道了我在日本講授酈學之事，而主動與我通信。吳先生當時已有不少酈學專著，但都為內地所不見。他不久就郵寄相贈，而其中《楊惺吾先生年譜》（臺北大學印書館 1974 年版）確實是他畢生治酈的力作，令人欽佩奚似。而寄贈幾種他個人的酈學專著以後，竟又慷慨地將全套原版《胡適手稿》三十冊相贈。胡適是近代學術界重要名流，而他在世的最後二十年，竟傾全力於酈學研究，《手稿》三十冊中（分為十集），一至六集共十八冊全為他的酈學匯萃。對於楊守敬，他在潘存《叙語》（潘對楊的讚揚）上曾經發表了駁斥的意見（《手稿》第五集中冊）。但他在《手稿》同集中，還是全錄了《鄰蘇老人年譜》，說明從總的方面，他對楊氏治酈還是欽佩的。所以在學術界特別是酈學界，對楊、熊《水經注疏》這部巨構，確是一致給以極高評價的。

值得讚賞的是楊、熊後人，他們秉承先人治酈業績，對《水經注疏》從事增補，寫出了幾種補篇，特別是楊氏後人楊甦宏、楊世燦、楊未冬三位最近完成的《水經注疏補》（上編），廣徵博引，為《水經注疏》平添了無限風采。而且在如此浩瀚的《補》篇以後，作者們竟仍有繼續再補的意圖，實在令人振奮和讚歎。《中庸》說：“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楊氏後人這幾位學者的舉措，為人為學，都是不同凡響。“酈學界的一件大事”之語，恐怕還不足概括呢！

我往年思考《水經注》研究與地方的關係，曾撰有《蘇州酈學家》、《徽州酈學家》和《湖北酈學家》三篇短文，後來收入於拙著《酈學札記》（上海書店 2000 年版），其中《湖北酈學家》文內說：“在中國歷史上，常常出現某一類學問家集中在某一個地方的現象。……除了蘇州、徽州二府外，另外一個酈學家匯萃之地是湖北省。與上述蘇、徽二地不同，湖北省的酈學家出現甚晚，始於清末民初，其中的關鍵人物是楊守敬，此後有熊會貞、徐恕、唐祖培、李子魁等，他們都與楊守敬有關。”這裏需要說明一下，我把李子魁也列在其中，這既是一種寬厚待人的態度，也是一種就事論事的做法。儘管此人在《水經注疏》一書中的弄虛作假已

經爲胡適及不少其他現代學人所揭發，特別是熊茂洽先生在《水經注疏·三峽注補》（楊世燦、熊茂洽注補，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的《後記》和楊世燦先生《楊守敬〈水經注疏〉稿本辨偽》（《宜昌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5 年第 4 期）等文中，把他的作偽經過完全講清，而此人早年在燕京大學時“學問平庸，爲人華而不實”的種種表現，也在葛劍雄先生《往事和近事》（三聯書店 1996 年版）一書中的“開風氣者”與“爲師者”篇內寫得淋漓盡致。但考慮到與當今的學術腐敗相對比，李子魁的作偽實在還算輕微，而且儘管如葛先生文中引顧頡剛老師對此人“資質之低誠無庸諱”的話，但他畢竟還是在《水經注疏》一書上做了點滴工作。所以我在拙文中仍然把他列名其中。拙文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與蘇州、徽州相比，湖北酈學家興起最晚，但令人欣慰的是，這裏的酈學家和酈學研究後繼有人。1992 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楊世燦、熊茂洽合著的《水經注疏·三峽注補》。著者熊茂洽，是熊會貞的嫡孫，真是家學淵源，而《三峽注補》的另一作者楊世燦，則是楊守敬的後人。湖北酈學家雖然後起，却大有希望。”

事情的發展確實令人鼓舞，因爲隨著楊、熊《三峽注補》於 1992 年問世後，熊茂洽、曹詩圖的《水經注疏·江水校注補》接著於 1999 年在武漢水利電力大學出版社出版。熊茂洽先生曾于 1993 年不遠千里從宜昌到杭州，專門爲補注《水經注疏》的工作和我面談，此事楊世燦先生在《三峽晚報》2000 年 11 月 6 日的《熊茂洽軼事》一文中曾作過記敘“不遠千里至杭州大學拜訪了當代酈學大家陳橋驛先生。陳給予了高度評價：湖北是楊、熊的家鄉，《水經注疏》是此省酈學先賢的傑出成果，爲此，當代湖北酈學家的工作值得作出更高的評價和更多的關注”。當年，我對熊先生的惠臨舍下實在不勝感動，所以當他後來爲其《江水校注補》一書求序於我時，我欣然命筆，說了一些發自內心的語言。

而供職於宜昌《三峽晚報》的熊茂洽先生侄女熊瓊女士又專程於 2005 年 8 月從鄂地到杭州舍下相見，並合影留念，以後還幾次通信，讓我非常感動。我和楊、熊仿佛有“酈學一家人”的夙緣。

對於民國以來酈學研究中的良好學風，我在拙作《民國以來研究〈水經注〉



之總成績》(此文發表於1994年《中華文史論叢》第53輯,又作為拙著《水經注校釋》的卷首代序,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等文中都以熊會貞為例,除了我對熊氏畢生為學為人的崇敬以外,也表達了我對楊、熊《水經注疏》在酈學領域中所取得高度成就的重視。希望湖北在分省、分流域的酈學研究中成為大家學習的榜樣,讓當代酈學研究獲得更大的發展。

使我不勝欣慰的是,楊世燦先生的巨構《楊守敬傳記》更名《楊守敬學術年譜》。經過他的多年耕耘,2004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記得賀昌群先生在北京本《水經注疏》卷首《影印〈水經注疏〉的說明》中有“長江後浪催前浪”的話。正是以楊守敬為前驅的湖北酈學家的執著努力,讓這個長江流貫的省份中,繼續不斷地在酈學研究的領域中出現“後浪催前浪”的壯觀。

楊守敬是一位聲名卓著眾所周知的晚清學者,有關他的生平業績,已經有了不少文字記載流傳,其中最原始的資料當然是出於他自己的《鄰蘇老人年譜》。作於清宣統三年(1911年)十一月,見於其自序。他說:“前年蘇州李文石勸余自為年譜,余謙讓未遑。”而這一年始作,是由於日人水野疏梅之請。序中說到由於水野“又欲得余小傳,歸而告其國人。今年命將盡,乃徇其請,追述生平,記憶不審,年月錯誤,在所不免,然不敢虛浮妄作,其間拉雜瑣碎,強半不文,意在示我後人,不足為外人道也”。以古稀之年回憶畢生經歷,“記憶不審,年月錯誤”,當然難免,但這畢竟是他自己親手寫作的文字,是後人為他撰寫傳記的基礎。楊氏《年譜》終於辛亥(1911年)十一月十一日,從民國元年起至四年(1915年),則是熊會貞所續。民國三年(1914年)楊守敬從上海去北京與陳衍相見,這大概是陳衍為他寫作傳記的因緣,陳所撰《楊守敬傳》收入《虞初近志》卷七,是後人為楊守敬寫作的第一部傳記。我所見到的楊氏第二部傳記是汪辟疆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發表於《國史館刊》創刊號的《楊守敬、熊會貞合傳》,內容與後來收入於《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的《楊守敬傳》基本相同。196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劉禹生《世載堂雜憶》一書中,也有不少記及楊、熊的故事。特別是我的香港故友吳天任先生,曾付出大量時間精力,廣

搜博引，於 1974 年在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了《楊惺吾先生年譜》一書，從楊氏出生之年（道光十九年己亥 1839 年）起，一直寫到他卒後五十六年（1971 年）臺北中華書局影印出版《水經注疏》止，全書逾十五萬言，內容堪稱詳盡。我個人由於研究《水經注》的因緣，也對這個課題作過一點膚淺的涉獵，曾經寫過《歷史地理學家楊守敬及其〈水經注〉研究》（初發於《書林》1987 年第 4 期，收入拙著《鄴學新論——水經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一文。譚其驤先生於上世紀 90 年代初主編《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上、中、下三卷，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我曾應約寫了《楊守敬》、《熊會貞》二篇，收入此書第三卷。

前已述及的已故香港鄴學界吳天任先生，他的治鄴專著甚多，晚年又撰成《鄴學研究史》一書（臺北藝文印書館 1991 年版），卷首有拙序，卷末附有摺疊的《鄭德坤重編水經注圖（總圖）部分》，吳氏在此《研究史》中對楊、熊為學和《水經注疏》作了很高的評價。並稱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後又重版一次）的排印本，“在今日而言，實為《水經注疏》最完善之版本”。至於此處提及的鄭德坤先生，他是顧頡剛先生的早年高足，畢生治鄴，著名的鄴學工具書《水經注引得》（上世紀 30 年代哈佛燕京社所出多種古籍引得之一，但此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又重印出版）即他所編。他上世紀 50 年代曾執教於新加坡等處高校，晚年因病居香港而終。在北平時曾傾注於《水經注圖》，均在戰亂中遺失。拙撰《鄭德坤與水經注》（初刊於《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收入拙著《鄴學新論——水經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長文，可供參閱。

在以上不少撰述楊守敬生平經歷的文章中，除了我所寫的顯然屬於下里巴人外，其餘各家的撰述都有傳世價值，而其中特別是吳著《年譜》，尤為卓然可觀。但另一方面，由於楊氏學問博大精深，畢生經歷迂曲繁複，其自撰《年譜》稱詳，但多是就事直叙，而其間也難免“記憶不審”之處。以後各家據《年譜》撰寫傳記，成就固然可觀，但不僅魯魚亥豕間有所見，而內容也大多偏簡。所以我雖然確從這些著述中獲益良多，却也常有不足之感。作為一位著名學者，有關楊氏的傳記、年譜和其他文字，實在已不算少，我之所以對此猶感不足，主要大概

有兩種原因。第一，我個人研讀《水經注》已逾六十年，讀楊、熊《注疏》也已四十多年，在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中，我為楊氏總結了他在鄴學研究中的五大成就。當年段熙仲先生精心點校《注疏》，我又竭盡駑鈍作了復校，並在卷首寫了萬餘言的《說明》，提出了一些心得和問題。其實平心而論，我對《注疏》的研究還很膚淺。所以常常希望通過其傳記探索他的鄴學思想。第二，我在大學地理系及地球科學系執教已經五十餘年，對高等學校地理教學實在情有獨鍾。而楊守敬實為我國高校的最早的地理教師。2000年，臺灣中國文化大學舉行“中國史地關係學術討論會——紀念張其昀先生百歲誕辰”。我在送交此會的論文《論史地關係》（載會議《論文集》）上册，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2000年刊印）中論及，地理學曾經長期依附於歷史學，清同治十年（1871年），李鴻章為李兆洛《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作序，序中提出“輿地之學，為讀史第一要義”。拙文由此聯繫到楊守敬在李鴻章的“第一要義”以後又二十多年，地理學終於成為一門獨立課程在高等學府建立。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湖廣總督張之洞聘請楊守敬和鄒代鈞到武昌，楊守敬治舊地理，鄒代鈞治新地理，分教兩湖學院。說明到了清代末年，地理學實際上已與歷史學分家。作為一位熱衷於鄴學並長期在大學地理系執教的人，對於楊守敬這位鄴學泰斗和中國高等學府地理系的開山宗師，我當然希望能夠更多地獲悉他當年在兩湖學院主講舊地理（即歷史地理，其中當然包括鄴學）的細節。

楊世燦先生的《楊守敬學術年譜》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我多年來的願望，這確是一部全面記敘楊守敬的煌煌巨構。此書的價值，我認為在鄴學和傳記兩方面都不同凡響。在鄴學方面，我是鄴學界的後輩，而此書的傳主乃是著名的鄴學巨人，通過此書對楊守敬在中國歷史地理特別是鄴學研究領域中的詳細而深入的記敘，當今的鄴學界包括我在內，當然受益無窮。從傳記的角度評價，我於1997年有幸被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聘為榮譽委員，在此前後，曾對國內外古今著名傳記稍有瀏覽，所以我認為楊世燦先生的這部書，可以列入優秀的傳記之林。楊先生是楊守敬的族重孫，在當代湖北鄴學家之中，具有承前啟後的責

任。據近幾年楊世燦先生來信所告，正在努力繼續為《水經注疏》作《補》。他已經在三峽和江水的《補》中作出了不小的貢獻，為湖北鄴學家作出了“啟後”的示範。現在，他將《水經注疏補》的世學，又傳給他的兩個兒子。長子楊甦宏以經濟管理思想治《水經注疏補》產生新發展，論證了建設“城市社區沼氣系統”治理水資源污染的可行性。楊甦宏 2005 年於烏克蘭國家礦業大學獲得哲學經濟博士學位，歸國後在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任教，曾數度來看望我並帶來書稿請我作序，我實在為楊家世學後繼有人高興。我認為，《水經注疏補》（上編）有如下意義：

#### 一、一部研究黃河水文化的開山著作。

《水經》是中國第一部古水志，共記錄水道 137 條的源流經歷，約一萬字。寫作背景大約在公元 223 年大水災之後，成書於公元 226 年左右。據戴震考證，作者不是桑欽、郭璞，而是三國魏初無名氏。近以為是東漢魏公幕僚王粲等撰，是一部官書。到了北魏，酈道元（字善長，公元 465 年或 472—527 年）為東荊州刺史時，因為為官刻峻，得罪皇親貴族而遭免官，還京閒居九年（515—524 年），這其間當為酈道元作《水經注》的時間。記錄 1252 條水道，窮源竟委，三十餘萬字。該書首先是一部水利著作。其次，它因水證地，兼及歷史沿革、文化現象，是一部不朽的歷史地理著作。其三，其優美的山水散文，有較高的文學價值，為歷代文人所愛賞。1974 年日本平凡社將《〈水經注〉抄》列在《中國古典文學大系》（共 60 卷）第 21 卷中。自宋代以後，研究酈道元《水經注》的約有 70 家。到了清季，楊守敬盡採諸家之長，和熊會貞一道，前後因襲用力四十八年，編撰成《水經注疏》，共 40 卷，計 150 萬字。該書繁徵博引，且兼體例嚴謹，考訂精詳，使《水經注》再一次放出異彩，成為一部“集前人之大成”“後來居上”的酈學巨著（《中國水利史稿》語）。總之，圍繞《水經》這部著作，從三國無名氏至北魏酈道元，再從酈道元至清代諸儒，到楊守敬、熊會貞，一千多年來，前人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地理學方面的遺產。這些遺產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價值。如何繼承這些遺產，並為其注入現代治水的科技經濟成果，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大

課題。《水經注疏補》(上編)以《水經注疏》為綱,以黃河主幹為內容,校勘、注釋、今補,為當今研究開發黃河流域經濟發展和水文化,奉獻出了一部開山著作。在這個鄴學名省,由鄴學世家賡續鄴學先賢的事業,實在令人不勝感慨。鄴學經歷了《水經》、《水經注》、《水經注疏》的過程,後經湖北人民出版社《楊守敬集》編委王永瑞先生點津,研究重點放在“補”入現代科學治水成果上,形成“經、注、疏、補”四個階段,使“補”更加有助於社會、經濟和生活,實為政府近年宣導的科學發展觀思想之體現。

二、一部完整的《黃河補》,它補充了黃河源出至河口河道的變遷情況,以及現代的開發情況。

《水經注疏補》(上編)以段仲熙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為工作本,按一至十卷分卷作補。如學林界頗有爭議的卷一,解譯了中國西部九大水系的水源,分析了西部佛國文化,確定了昆侖釋氏所指,科學的確定了神仙居地與現代旅遊景點的關係。歷史上的源出地名,以現代縣地圖為基礎,補到村級地望,一了過去的爭論。

三、《水經注疏補》(上編)吸取了黃河流域治理的新成果。其中大量的工作是補入新中國成立後六十年的治黃成果。簡單地說,黃河上游要補入開發水電基地的資料,新資料的補入,使治《水經注》地理學派步入綜合水利、水電、防洪、灌溉、航運、環保、管理等新興學派階段,但仍不失歷史地理學本色,這是鄴學事業新生命的開始,亦是鄴學開拓性的貢獻。

四、《水經注疏補》(上編)為鄴學研究事業正本清源。鄴學事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名山事業。《水經注疏補》(上編)大體對鄴學研究中的“知識產權”等問題作了一些交代。這些問題主要是:一是鄴道元拯救了中國的無數流失珍籍,鄴道元在《水經注》中,引書共 176 種,如《河水注》所引曹操鄴城,現在只能從《水經注》中讀到鄴城繁華的文章記述。楊守敬、熊會貞一一注明出處,現在《補》又詳加注釋。二是《中國歷史地圖集》出自《水經注圖》。《補》充分利用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此《圖集》在 1954 年開編之初,編輯機構曾稱為

“楊圖委員會”。所以儘管由於技術原因重新繪製，但其基礎如譚其驤先生所述，出自《楊圖》。熊會貞爲《楊圖》盡功其事，却未留姓名。三是讀懂熊會貞最後修訂的凡例，“此全稿復視，知有大錯”，指的是北京本。熊會貞在臺北本上，繼承和發展了楊守敬的鄴學思想。北京本當然是楊、熊二人的成果。在楊去世後的二十二年中，熊會貞修訂的北京本，重新擬定 39 條凡例。“此全稿復視”，復視的是北京本而非臺北本。這一點尤其重要。“知有大錯”，指的是“底本”、“全、趙、戴”和“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三項主要內容。他在凡例中明確指出：原以王氏合校本爲底本，今以朱是者作正文；原“全、趙、戴並舉，今以戴名過於趙，作戴、趙改”。並在臺北本中大量補充了“殘宋本、《大典》本、明抄本”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先生未見。有的且與先生定論相悖，但熊會貞爲了鄴學思想的發展，科學地作了處理，尊師兩全。四是熊會貞爲了學術高風亮節，不計名利。《水經注疏》：“先生初說，此書二人同撰，文各一半。”“每篇首標題作：宜都楊守敬纂疏門人枝江熊會貞參疏”，熊會貞在凡例中改爲“文先生三分之二，會貞三分之一”。在處理先生未見之書時，熊會貞安排“盡改爲先梅（楊守敬之孫）按殘宋本作某句、《大典》本作某句、明抄本作某句”。五是進一步對近現代鄴學研究中的“膳清正本”的疑案進行了澄清，使“李子魁補疏”僞事真相大白，論證了所謂“膳清正本”即臺北本。六是闡釋了熊會貞對楊守敬學術思想的發展，論證了臺北本比北京本更具科學性。但北京本也獨具所長。當然，作爲一本開拓性的鄴學研究著作。《水經注疏補》（上編）也有一些尚可商榷之處，但畢竟瑕不掩瑜，而且深信作者們必然還要繼續從事研究。

陳橋驛

2009 年 4 月 19 日於浙江大學

## 前 言

《水經注疏補》以江蘇古籍出版社段熙仲校、陳橋驛復校（一九八九年六月版）《水經注疏》為工作本。參校《楊守敬集》中謝承仁、侯英賢整理的《水經注疏》（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以及王國維《水經注校》（袁英光、劉寅生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兩種本子，並參考近現代考古、歷史地理、水利及酈學研究成果對每卷集中作補。《水經注疏補》分為經、注、疏、補四個部分，經文用四號黑體，注文用小四宋，疏文前加“疏”字，補文加“補”字。

《水經》為東漢末魏初無名氏所撰，一萬零八百字（含標點），記水一百三十七條，是一部水利之書。北魏酈道元以《水經》為綱，公元五一五年至五二四年，閒居京城九年，撰《水經注》，記錄一千二百五十二條水道，窮源竟委。該書首先是一部水利著作。其次，它因水證地，兼及歷史沿革、文化現象，是一部不朽的歷史地理著作。其三，其優美的山水散文，有較高的文學價值，為歷代文人所愛賞。歷代研究《注》者達七十七家，湧現出考據派、辭章派、史地派和水利學派。

楊守敬、熊會貞以《注》為綱，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五年，“集前人之大成”，“後來居上”（《中國水利史稿》語），形成北京本《水經注疏》；後二十二年，熊會貞發展先生的酈學思想，修改凡例，獨任其力，形成一九三七年的《水經注疏》正本，一百五十萬字，由楊氏後人交給民國政府，輾轉香港、臺灣，現藏臺北，即世稱之臺北本。《疏》分清經、注，改正錯訛，點明出處，解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典故，指明歷史因襲沿革，釐清水道，疏證古代水利工程建設舊迹，追溯流域人類氏族及文明生存文化等，六十載一書，實至名歸，真可謂是一部藏之名山的國粹珍寶。

段熙仲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是目前最好的本子。段熙仲依據一九五七年北京科學出版社出版之影印本《水經注疏》為工作底本，參照明、清以來《水經注》研究者之諸刻本及經、史、子、集史料予以點校、增刪、勘誤。陳橋驛按一

九七一年臺北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之《楊、熊合撰〈水經注疏〉》本，參以鍾鳳年《水經注疏勘誤》，結合個人研究成果，對段先生所點校之底本予以復校、增刪、勘誤。就其學術價值言，可謂楊、熊《水經注疏》本之最佳。故選其為《水經注疏補》工作本。

《水經注疏補》是鄴學研究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一個過程，是《水經》研究發展的第四個階段。撰者自不量力，在前賢認真校勘的基礎上，以《疏》為綱，以水利經濟服務人類社會為宗旨，補以如下各點：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參照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圖》和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以今縣地圖一一對照《經》、《注》、《疏》文。二、水道名以今名、古名、異名並舉。三、水源源出地點不變，山名異出，確定今名即古名或山或谷之地名。四、今水水源往往長於古水源，是古人探索水源交通諸條件及資料所限，定以今水為源。五、一水數源，多源並舉，以最長者為主源。六、每卷注明“參見今某省某縣某城某鄉鎮或某村地圖”及版本日期。七、補以河道沿岸考古遺址、名人墓葬、紀念地址、名勝景觀、風物特產。八、水道流逕漢以前的縣、城名，鄴氏稱故縣、故城，在《疏》文確定中心座標點的東、南、西、北或東南或西北或東北或西南里數指導下，補明今縣、城、鎮、鄉、村之準確地望。九、補以流域水利水電開發治理發電、灌溉、航運、防洪基本情況。十、補以水環保專題和探索水利經濟學發展方向。此次出版的《水經注疏補》（上編）是對《水經注疏》一至十卷作補，今後還將完成後三十卷的補，陸續出版中編、下編。

鳴謝浙江省社科聯省級社會科學學術著作出版資金與杭州電子科技大學學術專著基金資助出版。特別感謝陳橋驛教授多年來的鼓勵與支持，感謝中華書局王勛編輯在出版中的專業與細緻的工作，感謝曾昭鑫、曹曉宇、陳剛諸先生與段顯明、謝正苗諸教授給予的幫助。出版之際，特別感謝母親李福琴、夫人朱峽多年的默默支持。

楊甦宏

二〇一〇年春於杭州下沙



## 《水經注疏》凡例

自閻百詩謂郭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也而後，郭璞撰《水經》之說廢；自《水經注》出，不言《經》作于桑欽，而後來增益之說，爲不足憑。前人定爲三國時人作，其說是矣。余更得數證焉。《沔水經》：“東過魏興、安陽縣南。”魏興爲曹氏所立之郡，《注》明言之，趙氏疑此條爲後人所續增，不知此正魏人作《經》之明證。古淇水入河，至建安十九年曹操始遏淇水東入白溝，而《經》明云，“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此又魏人作《經》之切證。又劉璋分巴郡置巴東、巴西郡，而《夷水》、《漾水經》文只稱巴郡。蜀先主置漢嘉郡、涪陵郡，而《若水》、《延江水經》文不稱漢嘉、涪陵。他如吳省沙羨縣，而《經》仍稱江夏、沙羨；吳置始安郡于始安，而仍稱零陵、始安；蓋以爲敵國所改之制故外之；此又魏人作《經》不下逮晉代之證也。

至于《注》中之文出于酈氏後者，如《漾水》篇中之長松縣，是爲隋開皇十八年所置，已爲趙氏拈出。今余覆校《夷水》篇之宜都縣，是陳天嘉三年所置。（《蘄水》篇之齊昌郡，明稱後齊，則戴氏所增改。）他若梁武新制之郡縣，《注》中所載甚多，不第引吳均之語爲不比也。此皆後人竊入。

古書言水，名稱錯出，源流參差，酈氏以互受通稱說之，遂覺渙然冰釋。此例實發之《禹貢》。《禹貢》：“江漢朝宗于海”，蓋以二水並大，非一水所得專其名，故並稱之。班孟堅識此例，故湖漢水、豫章水同流，而各言入江；西漢水、潛水同流，而各言入江；其他入河、入海之水，如此者尤多。《水經》淇、漳、聖、巨等水並言入海亦此例，皆酈氏所謂互受通稱者也，前人引而不發，至酈氏始明言之，真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亦有班氏未言而酈氏引伸之者。班氏謂恒水入滹，衛水入滹沱，以恒衛釋《禹貢》，以滹、滹沱綴《職方》。酈氏謂恒即滹，衛即滹沱，今本缺滹沱篇，以滹水例之必有此說。互受通稱，而後知《禹貢》紀恒衛不言滹、滹沱之故。近儒謂恒雖小，曾所